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Kertész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Imre

Az angol lobogó

英国旗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Imre Kertész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

Az angol lobogo
英国旗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03-1197 号

英国旗 AZ ANGOL LOBOGÓ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under the title "AZ ANGOL LOBOGÓ"

Copyright © 1991, 1998 by Imre Kertész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旗 / (匈) 伊姆莱著; 余泽民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4

ISBN 7-5063-2665-5

I. 英… II. ①伊…②余…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匈牙利-现代 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857 号

作者: (匈) 凯尔泰斯·伊姆莱

译者: 余泽民

审校: 冒寿福

责任编辑: 汉睿 朱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05 千

印张: 6.75

插页: 4

版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665-5/I·2649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凯尔泰斯·伊姆莱

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1944年，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

1946年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并获得成功。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无常》。1975年，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六七十年代，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其中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

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寻踪者》和《侦探故事》，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惨败》、《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中篇小说集《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及《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科舒特奖，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余泽民

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奥地利《中欧时报》编辑、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硕士研究生，从事艺术美学与心理学研究。

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同时攻读匈语，研究匈牙利文学。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匈牙利及中东欧当代作家的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三十余部，并从事个人文学创作。现定居布达佩斯。

审校：瞿寿福博士

语言学家。现任匈牙利政府官方翻译、国家翻译考试中心考官、匈牙利中文翻译协会名誉会员。

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同时学习匈牙利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开始从事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工作。

1959年随著名汉学家高恩德赴匈定居，并加入匈籍。几十年来，一直在布达佩斯厄特沃什·罗兰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和翻译课。1980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翻译或合译过《裴多菲诗选》、《尤若夫·阿提拉诗选》、《尤若夫·阿提拉小传》、《夜莺》、小说《我是证人》、《巴尔街的孩子》和《爱盖尔之星》等匈语作品。另编有《匈汉大词典》。

他为人类的堕落作证(序)

余泽民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谁是凯尔泰斯？

2002年10月10日13点01分，这是一个可以说让全世界“惊喜交加”的时刻：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名叫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的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不但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而且通过文学创作，以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相抗争。

就在这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

谁是凯尔泰斯？即便在匈牙利，人们也都兴奋地奔走相问这个

让他们感到陌生和骄傲的名字。

我对凯尔泰斯其人的“侦探”，也是从这个本来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开始的。最后，我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作家留在布达佩斯二区的空巢。这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五层板楼，楼里的邻居说：作家大部分时间客居德国，只偶尔回来。他们知道的凯尔泰斯，是一位深居简出、和蔼平易的作家，但是至于他写过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读过。但是，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确实使这个居民楼变了个样。人们还不知道作家何时回国，传达室里等着请作家签名的书就已堆成了小山，寻踪问迹的记者更是络绎不绝，家家门口、楼道走廊上都摆满了鲜花，期盼作家的归来。

在继之而来的几个月里，电视里、报纸上、杂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作家那副可以把世界融化的笑脸，可以看到那双拥抱世界的大手；到处听到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幸运和他“一夜成名”的惊叹与嫉妒……作家笑言：“我必须站在媒体宣传和记者群中。成功也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七十二岁老人度过的，是七十二个寂寞的三百六十五夜；在这位耄耋之年的“幸运儿”背后，难道仅仅是人们看到的幸运吗？

或许，我知道了凯尔泰斯的面孔，但是，凯尔泰斯究竟是谁呢？

二、他对自己也感到陌生

凯尔泰斯于1929年11月9日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普通犹太家庭，他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自从出世那一刻起，就熏染了犹太民族独有的沮丧和代代相传的苦痛，铭刻下了不幸命运的历史烙印。

作家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自述道：“我的母亲来自特兰斯瓦涅（现罗马尼亚境内的艾尔代伊匈族区）的克洛什瓦城，父亲来自巴拉顿湖的西南部。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祖父祖母总是依照旧习点燃一支安息日蜡烛，然而他们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匈牙利名字。对他们而言，把犹太教视为自己的宗教，把匈牙利视为自己的祖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我的外祖父母死于纳粹的犹太大屠杀。在拉科希的赤色统治下，祖父母的生活再次被摧毁，他们跟随其他的犹太人一起，被迫将经营多年的家园迁到了匈牙利的北部边境。我想，我们简单的家史浓缩了、反映了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痛楚。它教给我的，不仅有辛酸与悲哀，更有伟大的道德潜力。”

父母的离异为凯尔泰斯的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阴影，使他成为同龄人中早熟的孩子。1944年夏天，命运将年仅十四岁的凯尔泰斯投入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境内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从集中营出来，他没有像许多同胞那样选择去发达的

西方，而是怀着一腔热血回到了创痕累累的祖国。

1948年凯尔泰斯中学毕业，先后以记者身份在《光明》报社和《布达佩斯晚报》报社工作了两年。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字生涯——“一段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

1951年至1953年，凯尔泰斯曾当过两年工人，同时担任工业部新闻处的“外围记者”。之后以“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艰难为生。他先后翻译了大量的德语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思想受到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霍夫曼斯蒂尔、施尼茨勒等人的深刻影响，对个体与社会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同时，也正是由于他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受到了德语文学界的关注，而凯尔泰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的作品，也正是通过德国出版界的赏识和力荐，才能幸运地戴上这顶至高无上的“文学桂冠”，而在匈牙利，在作家自己的家乡，他的名字却极少有人知晓。

1975年，经过近十年的挫折，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才得以出版。正是这部自传性作品，使他开始孤独的思想跋涉，并在二十七年后将“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至今让全世界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镌刻到了世界文学史的丰碑上。

这便是我们可以通过媒体手段了解到的“编年史上的凯尔泰斯”。然而，当凯尔泰斯本人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上的时候，却坦白道出了另一个更接近“真实自己”的自我：

“首先，我要怀着一种非同往常的愧疚心情坦率地承认，自从我登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起，我就习惯性

地感觉到，似乎有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尾随在我背后盯梢。甚至在这个特别的场合，当我站在你们视线的交叉点上的时候，我仍旧觉得自己更接近那个不动情感的观察者；而对于这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对这个突然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读者的作家，我反而觉得比较陌生。”

的确，在我伏案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那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而那个尾随在获奖的凯尔泰斯背后不动情感地进行观察的凯尔泰斯，对我来说仍是陌生的。

三、他为什么要表述？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犹太人——首先就要接受这个种族一次又一次遭遇的道德挑战。大屠杀无疑创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目标必定是通过心灵之旅来弥补不可能弥补的生活现实——达到所谓精神上的净化。在我创作生涯中，正是这种欲望激发了我的灵感。”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意义上的——自己并不认为的是文学的、为了生存下去的——写作。1975年《命运无常》的出版，就是这个漫无尽头的孤独旅程的开始。

凯尔泰斯的《英国旗》是《命运无常》的续篇。如果说《命运无常》为凯尔泰斯文学确立了基调的话，那么，《英国旗》则达到了成熟的“凯尔泰斯风格”的颠峰。

《英国旗》描写的是主人公——青年克维什（“我”）在五十

年代“冷战初期”的心灵历程。这位从纳粹集中营满怀希望地回到自己“解放了的祖国”后，却意想不到地坠入了另外一个野蛮专制的、不带“铁丝网”的集中营。无休无止的运动、批判、逮捕、关押、审判，“在监狱或者拘留所的走廊上，那些双手背后、脸冲着墙站立的犯人，就像细菌一样疾速地繁殖……甚至可以这样说：就连监狱之外的所有人——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每个人——实际都是这座监狱里的囚徒，只不过是被视为‘无期假释’而已。”（摘自《英国旗》）

五十年代初，克维什（“我”）开始了记者生涯，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表述生活的冒险”。虽然现在来看，作者所说的“表述”也可以理解为“写作”；但是在当时，从绝对意义上讲，“表述”并不仅仅是落在纸面上的写作，他还包括了“无须表述的、哑然的生活本身”。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作家并没有写作的自由。

作者在《英国旗》的一开始，就写出了生活中“需要表述”与“无法表述”之间残酷的矛盾：“这条生命，始终在殚精竭虑地为了生存和希望，而且总是与我今天所怀抱的希望、以及我今天所能用语言做出的表述相冲突，总是接连不断地宣告惨败，总是接连不断地陷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窘境，总是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与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相较量。”最初，克维什（“我”）因为受到一本“并不真实的”描写布达佩斯记者生涯的小书影响，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作者认为：那只是他生活中的一段“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是一种“客观的表述”。

就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在一次无聊的政治学习之后，这种貌似平和的“幼稚无知的客观表述阶段”被一辆恐怖的黑色轿车带走了……“从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讲，我陷入了错乱，也可以这样说，我坠入了危机，失去了‘用语言表述’的避难所……我的生命变得更加无法表述，从而使我的生命进程也变得疑惑不定。”

主人公陷入困惑的同时，对“现实的自我”进行了第一次否定，否定了自己通俗意义上的“幼稚的客观表述”形式。就这样，一个有天赋的记者在这个编辑部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天赋的记者。“从那一刻起，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我游离在了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一个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之外……”

精神上的失落使主人公离开了报社，当他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咖啡屋里被人介绍给一位“年轻记者”的时候，对方的一句“后来变成了神话了的”自我介绍——“我曾是塞朴·耶努”——使他突然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以“自我否定”表白“自我存在”的表述方式。

“我——曾是——塞朴·耶努”，就是这一句话，使主人公对“现实的自己”进行了进一步否定，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放弃了“用文字表述”的努力，也就是说：他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开始了“非语言表述的冒险”。他成了一个丢掉笔的作家，一只收起翅膀的飞鸟。但是，他继续在写，是用思维写；他继续在飞，是用心灵飞。

也许，一个无须表述、已哑然逝去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述。

凯尔泰斯是个发现者，他除了发现了一种文化之外，还发现表述这种文化的方式。

《英国旗》是作者最坦诚、最真切、最激烈、最勇敢的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的文学自白：他为了存在而表述。

四、我曾经是凯尔泰斯

从文学形式上来说，《命运无常》仍旧保持了传统小说的写作形式，其哲学思维的特征只是掩映在文字的背后。从《惨败》开始，这种哲学因素逐渐增多，在《为了一个未出世孩子的哭祷》中，凯尔泰斯式的哲思文风已趋成熟。匈牙利文学评论家塞拉克·彼特指出：“从小说的‘素材’和小说的结构来看，《英国旗》是《惨败》以及《为一个未出世孩子的哭祷》的继续……可以这么说，《英国旗》含括了凯尔泰斯写作技巧的最典型、最基本的特征因素。”

《英国旗》在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写作技巧，比如，为与标题响应，文中几次三番地重复强调“有一群朋友极力鼓动我将这个英国旗的故事讲出来”的创作原因，从而增强了读者对“英国旗”的好奇和悬念。也许，当读者终于读到那几行短得可怜的关于英国旗的文字时，可能会感到一丝失望。但是，这丝失望只能持续短暂的一瞬，读者会在读完那些沉重、晦涩、构句复杂、不分段落、充满哲思与令人窒息的长句之后，终于将鼻孔浮出水面，终于在阴郁的天空中看到一叶彩色的风筝……

英国旗，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自由的意识符号。

“生存就是屈从”，凯尔泰斯在《英国旗》中再次表述这个观点。与《英国旗》相似，中篇小说《笔录》也同样、甚至比《英国旗》更加激烈地表露出作者这种“屈从”背后的抗争。

《笔录》讲述的只是一个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在一般人眼里恐怕很难成为写作题材的日常小事：老年的“我”在去奥地利的国际列车上，由于没有按规定申办“外汇携带许可”而被海关工作人员“合法地”扣留了准备“非法”携带出境的四千先令……但是，就是通过这桩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国度发生的小事，作者“听到了皮靴踩地的声响，听到了嘹亮震耳的革命歌曲，听到了凌晨十分刺耳的铃声。我看到了囚牢的铁栏，看到了缠着带刺的铁丝网的高墙。”就是通过一份“正式的、却不真实”的违章记录，作者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来饱经折磨、屡经驯化了的人，是一个无论意识中、个性上、还是在神经系统都深受创伤的公民——但是，与其说是一位公民，更不如说是一名囚徒”，就是通过这次没能实现的旅程，他感到“我就是自己的小说主人公的一个特殊翻版，我也和克维什一样动身走向一个宽广的世界，却抵达到一个位于上帝背后的、肮脏的边境小站，那里就是我的家，我贫困、绝望、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凯尔泰斯曾在一次讲演中承认：“每当我构思一部新的作品时，总要想到奥斯维辛。”《笔录》是作者继《命运无常》等作品之后对“大屠杀文化”的进一步发现。与早期作品不同的是，老年的“我”已经不再像少年克维什那样天真地接受、被动地屈从了，

他敢在海关人员面前重重地摔门，敢义正词严地要求修改官方的“笔录”，敢拒绝签字，敢在心中激愤地控诉：“这件事很难使人相信——这个国家是自由的。”

“一切已经到达了极点，再多的伤害我已经——看上去——再不能忍受。六十年的变迁，却始终几十年如一日的简单专制，所有现在无法命名的、肮脏可憎的专制已经碾碎了我身上由忍耐——由毫无原由的忍耐——所滋养的自身免疫力。我的躯体已被刺得体无完肤，吊坠在几根纤弱的神经束上，在我遍体鳞伤的身上，已经不能再找到一块可以插进一根矛枪、哪怕一支注射器针尖的地方了。我已经失去了忍耐的能力，我已经不能再被伤害了。”

这是控诉，是对专制的、缺少自己的社会的激烈控诉。

这是呐喊，是能够唤醒在现实中麻木生存的人们的呐喊。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匈牙利著名作家艾施泰尔哈兹·彼特诚心地说：“在世界上有一种痛楚和一种彻底的屈从，我们（我）只有通过凯尔泰斯的眼睛才可以看到。我永远感激他——诚心而论，与其说是感激他，不如说是感激他的作品《笔录》——使我在一个历险的、恐怖的瞬间里突然意识到一种屈辱，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或者说：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作者在《笔录》的结尾写道：“虽然，看上去我是在乘着火车旅行，但是列车上所运载的却是一具尸体。我已经死了。”

这才是凯尔泰斯，一个敢于通过“自我否定”而证明“自我存在”的凯尔泰斯。这种死亡，是一种重生。

我终于见到了凯尔泰斯，他从他的作品里走出来，跟我握手，

并对我说那句“已成为神话了的”自我介绍：“我——曾经是——凯尔泰斯。”

五、他是孤独的证人

“凯尔泰斯作品的题材相互构建，就像是一个魔匣。哲学不仅是凯尔泰斯文学作品的一个要素，而且占据了相当重的比例。”

另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匈牙利作家纳道什·彼特对凯尔泰斯作品的评论恰如其分。

人们通常喜欢用是否有“可读性”来评价一本小说，其实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只将“可读性”理解为斯蒂芬式的“故事性”。然而，当我逐字逐句地“啃完”凯尔泰斯的作品后，感受到了另一种与传统的阅读习惯全然相悖的“可读性”——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像是一种亢奋的自虐，正是那种疲惫、那种费解、那种沉重、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那种理解后的兴奋，使得我对这本《英国旗》爱不释手。

凯尔泰斯作品的难度，在于卡夫卡式的文学手段和凯尔泰斯式的哲学内涵上。也许可以这么说，凯尔泰斯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位孤独的哲学家。

在世界文坛上，凯尔泰斯是继卡夫卡后的又一位孤独者，他早已与自己生活的现实相分割，他的现实是自己向自己孤独地表述。对于这个社会，甚至对于自己，他都只是一位冷眼的旁观者。他是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尽管他也像他的小说《寻踪者》中的主

人公一样曾努力地寻找自己生存的证据，结果发现：周遭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在凯尔泰斯诸多的作品里，《寻踪者》是一篇十分独特的、也是作者自己钟爱的作品，从1975年到1998年，凯尔泰斯几次出版几次修改，到中国读者现在读到的译本为止，居然前后修改了二十三年！他自己就像那位一心寻踪的特派员一样，一次次地试图证实，一次次地惨遭挫败，现实一次次地告诉他：“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然而，在失望的同时，他又有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新发现——在沮丧之中，在放弃之后，他突然发现另一个瞬间——他发现了自己。在一系列对他人徒然地作证之后，他猛然意识到：他需要证明的是自己目前的存在。“除了这个时刻都在对感官发起进攻的、无法抵御的揣测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真实：这是属于这片温柔、沉静的大平原的夏日平和。对啊，他应该放弃身负的任务，应该接受这惟一的真实和可以把握的机会，应该接受这令人眩晕的夏日金黄。就像一只被脚步声惊醒了、正惬意地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蜥蜴，突然在他的脚下惊窜。”（摘自《寻踪者》）

这部卡夫卡风格的小说，展现了作者极其精美独特的文学语言，像魔匣一样怪诞的文学构思，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表述能力。《寻踪者》中的特派员、海尔曼和其他作品中的“我”一样，是一个在残酷野蛮的社会里失落了个人命运的个体，通过一次次执著和一次次挫败之后，仍在孤独寻找一种证明自我存在的表述。

“他要使‘目前的存在’闪出明亮的光芒，他要宣布自己‘尊